

当代散文研究

学者散文四图

孙 郁

摘 要：20 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学者散文回归，杨绛、季羨林、金克木、蓝英年一时灵思各表，中断多年的书写传统得以延续。或是个体经验咀嚼，或为人生哲学体悟，也有杂学杂识流露，以及历史的重写。学者散文中的个性精神与追问意识，拓展了审美空间，转识为趣中，心性与智性暗化在词语世界。不同知识背景里的诗意各异，杨绛偏于冷，季羨林略显热，金克木亦冷亦热，蓝英年冷中带热。他们的带有历史感的文本，以及承担意识，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品类。

关键词：学者散文；杨绛；季羨林；金克木；蓝英年

现代散文的出现，与一部分学者的实践是分不开的。民国初期，学术活跃，文章纷繁，新式的审美介入，便出现了白话散文。这种散文与古代文章略有不同，现代性的因素增多，个体生命的感受更为鲜活了。作者们既熟读古文，也了解一些域外写作，文风便有了不小的变化。除了周氏兄弟外，刘半农、废名、梁遇春、俞平伯、朱自清等都有佳作。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作者多了起来，可谓四面开花，叶圣陶、夏丏尊、顾随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冯至、巴金等都丰富了文章体例。他们的写作杂糅了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，常常在学问背景里透视人生，故不限于生活碎片，在社会这本大书里，觅出精神经纬。不过，象牙塔的写作有时候离现实略远，钟情于书林味道，妨碍了对现实的深入打量，但人文的情怀还是在的。后来因为战乱和时代更替，学人的散文

与随笔渐渐边缘化。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，书斋气的写作受到时风的抑制，工农兵的写作置换了知识人的位置，直到 80 年代后，情况才发生一些变化。随着老一辈学者的复出，旧的传统略有恢复。在《读书》《随笔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等报刊，学者散文大概成了受欢迎的品类，单调的文坛也因此多了一些古风。

学者散文的内容，除了谈论书林之意，便是书斋生活琐议，与一般作家写作不同，文字背后是有历史的，行文中也流出文气。这种文气在文坛消失了多年，厚重感也就多了起来。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写作不同，这一类人的作品受到古代文章的影响，许多人也略通西学，所以文本就有驳杂的东西在，有时也不免弦外之音。他们多少保持了母语的元气，对于那些空泛的文本是一种揶揄。其生命体验里除了直觉，还

有知识与哲思的沉淀,那些看似陈旧的诗文在他们那里被激活起来,形成意象的长廊。

本文主要谈及以下四位学者:杨绛、季羨林、金克木、蓝英年。由他们的写作,看知识人在特殊时代的四幅图景。中国的文学有时候不都在冗长的叙事里,往往在短小的辞章里见出气象。这个现象值得讨论,本文不过一点随感,旨在与文学史写作的朋友共享体会。

一、杨绛

杨绛是翻译家与剧作家,其散文写作在晚年多了起来。与她的爱人钱锺书不同,杨绛不是以学识的渊博耀世,而是以聪慧的文笔被人称赞。当然,也有人认为她的散文也是“深厚”,那多半源自生命体验的深。她的成名作是《将饮茶》《干校六记》,这些作品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初,乃一代知识人在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。其中关于傅雷、钱锺书、父亲、姑母、温德先生的文章,乃记人笔记中难得的佳作,其读人之细,阅心之真,在知识女性群体中一时难有人企及。

因为有着良好的知识背景,加之一直远离文化风潮,她的翻译与写作,都不在时风的热点上,故对于世间万物,能以平常心待之。在经历了战乱、亲友离别之苦后,其内心被冷冷的水浸泡过后,笔调是很清静的。她不善于写历史大事件的起落,写的都是知识人寻常之迹:刻画傅雷、温德先生的几篇都传神得很,寥寥数笔,人物的神飘然而至。她写干校的生活,于细微处见出临苦而不惊的心态,对于自己的经历,以感受和细节的描述为主,将时代的风雨隐在词语的背后。她在乡下世界所观所感,好奇心有之,冷思的目光穿透了夜幕,有微弱的光亮在;写自己从连队送钱锺书到住处后,回来时在雪地迷路的情景,夜景与心绪都逼真生动,焦急、不安中的信念感乃寒夜里的热流,意象是美的。她也善于自嘲,与钱锺书在乡下的各种心境都显得自然有趣。他们知道自己该寻找什么、拒绝什么,又能于逆境中面对云起云落,知识人的高贵之气弥散在字里行间。

以回忆的方式面对历史,杨绛带出来的是另类学人的生命经验,不同的知识结构使她看

待事物也不随波逐流。她描写父辈在民国年间的悲剧命运,显得从容不迫,不被前辈恩怨所囿。《回忆我的父亲》《回忆我的姑母》有政治的明暗,也带出战争岁月的抵抗之情,而其间学术思想与道德感纠葛的悖论,也看出存在的非逻辑性。这些前辈的思想都在左翼文化之外、新旧知识谱系之中,难见后来流行的趣味,故新中舍旧,旧里带新。而其精神也不乏绅士的某些趣味,但又无搔首弄姿的样子。他们留过洋,出入于知识界的大门,靠专业谋生,但政治偏偏找上他们。杨绛在他们的命运里看懂了历史的诡异。这些没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,丰富了世人对过往生活的另一种认识。

杨绛的读书札记写得饶有趣味、干净利索,毫无隐曲和伪态,一面也与读者有些隔膜。她的知识谱系里没有苏俄文学元素,英国趣味显而易见。其谈论文学的小品带有一点通透感,谈小说能够抓住筋骨,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,又善于引经据典,但显得自然。看得出,其审美眼光里,写实主义与传奇笔法,都是被欣赏的。《有什么好——读奥斯汀的〈傲慢与偏见〉》有着与同代人迥异的审美判断,智性与情绪的把握冷静而独到。她发现作者在笑的地方,有不笑的一面,认为笑的审美“不是调和”,有价值标准,亦带着启人心智的一面。《堂吉珂德和〈堂吉珂德〉》不仅有人物分析,甚至连阅读接受史也浮现出来。不同时代的人对小说评价的差异,说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。作者意图与读者感受不在一个逻辑线条里,这也是作品不可简单言说的例证。她在小说文本里,留下了诸多趣谈。杨绛以为,小说的非同寻常之处,是嘲笑主人公的时候,也嘲笑了作者自己。除了域外文学的心得颇引人注意,她对旧式文学亦有不俗之见。在《事实——故事——真实》一文中她将不同类型作品进行对比分析,由《红楼梦》言及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,古代美学要义和小说叙述技巧被还原出来,“虚构的故事要表达普遍的真理”,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如何,论述得分寸感很强。这种分析,步步为营,水到渠成,文字老到自如,显示出良好的叙述修养。

关于读书,杨绛有个说法,认为读书是“隐身”的串门,在古今中外之地游历,见奇书而惊

异,读佳句却忘返,而自己的辞章也因此得以生长。看其文字,都非做作之语,就那么自如地流淌着,无意中也有隐喻和妙意流动,翻译的乐趣与解析的乐趣交错而行,文脉里融进属于自己才有的灵思。她的散文与随笔,脱去了老旧之味,也无西崽调子,总之是通脱、自由的,日常用语被一种温和的精神之光照射,语句就于平淡中见出锐意。她的行文风格自成一格,能够在不经意间发现存在之趣,读书得智的欣然比比皆是。世人要模仿她的笔调,其实也不容易的。

二、季羨林

季羨林在高中时期受到董秋芳老师的启发,开始散文写作,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,才引起文学界的普遍注意。他在北大讲授东方学,是少有的博学之士,在学界颇有些影响力。晚年笔耕不辍,成了未名湖畔的一道风景。影响较大的作品主要有散文集《留德十年》《牛棚杂忆》《赋得永久的悔》等。

对于常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季羨林而言,文学也是他的梦想之一。他早年在清华读书,后去德国留学,归国后在北大任教,经历了民国文化和新中国初期文化的变迁。又因为所学的是巴利文、梵文,他对于东方文明颇多体味,所以行文题旨与一般留学归来者不同,东方哲学与儒家意识浓烈,文章也带有传统书生的本色。但其又不偏于一隅,对于老北大、清华的传统情有独钟,崇仰陈寅恪,喜欢胡适,对于傅斯年、朱光潜亦多留念之感。其文平实老到,直抒性灵,又无绅士气,平民的质朴在字里行间晃动。

在众多作品中,他的怀念人物散文,背后是对百年文化的总结与感叹。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写“五四”知识人起落,百味杂陈,千回百转,自由意识是浓烈的。《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》中的沉痛之语,有悼念屈原式的歌吟,也有老舍生前的一些片影,写得真实传神。《回忆梁实秋先生》一文,不以流行的看法写这位前辈,能够写出其特有的价值,可谓知人论世的典型。《扫傅斯年先生墓》对于率真无伪的傅先生的感叹之语,见出其性情之真。作者写远去的一代人,有意在纠正先前文学史与学术史的偏

见,为那些遭遇不幸的人说些公道话,这些都看出他对于老北大人的感情之深。季羨林不是以学理来打动读者,而是用真情还原生命的体验。他的散文没有张中行的哲学之味,也无金克木的杂家气,而是以平民之语写文史之境,就与千万读者的距离很近了。

从诸多散文随笔中,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,对独断论颇为警惕,所以对不同流派的学人和作家,都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视之。他大约在知识论层面有诸多创建,对近代哲学中的脉息得之不多。但真学者只说平常语,所以他的散文也是随意自然,不刻意经营,也非卖弄什么。他也自知个人的有限性,对身边的高人充满敬意。比如欣赏张中行,喜欢赵朴初,在这些人那里,他感到了思想的深。

久在书海里,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。因为知道学海之深,自己仅是沧海一粟,他的表达带有明显的自审与自嘲意味。比如《三思而行》《老年十忌》《八十述怀》等,都显得通达、自律,清醒而平淡。《病中琐谈(在病中)》抵抗僵化思维,又能从反向思考问题,不断审视自己的有限性,文字就显得可亲、自然。检讨自己的一生,季羨林有点“逃名主义”,认为自己不是大师,学问平平。他一再强调“辞‘国学大师’”“辞‘学界泰斗’”,看得出其思想的本色和处世的态度。这种与人亲和的感情,使他的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。

季羨林的引人注目,一是其学问的神秘性,懂其专业者寥寥,在那时候属于稀有人才;二是其常以民族国家立场,说出宏大的思想,在改革进程中为国家助力。与一般学者不同的一面是,他虽然赞赏“拿来主义”,但更强调中国文化应该“送去主义”。过去人们喜谈西学东渐,季羨林则关注东方文化的世界传播、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西方的哲人与作家。他在文章中言及中国经籍西传的神奇结果,不无自豪之感。歌德(Johann Goethe)怎样喜爱中国古代文化,康德(Immanuel Kant)、费希特(Johann Fichte)、谢林(Friedrich Schelling)如何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影响,都是季羨林在文章中一再提及之事。他介绍东方文化自身的价值,连带出民族的自豪感,于是,得出“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”的结论。

《国学漫谈》《我们要奉行“送去主义”》等,都证明他是一个文化乐天主义者。

较之于前辈学者的散文,季羨林的文章守之于真而失之于简,六朝文与桐城派的文字对他的影响甚微,其行文的趣味在新文学的文脉上。他喜欢老舍和巴金,说明在审美方面也有与之相似的地方。文字随性而来,率真而去。在他那里,学术是学术,文学是文学,泾渭分明。但他的学问没有都在散文中体现出来,文气略显单薄,余味显得不多。倒是吕叔湘、张中行这样的学者,打通文史与美文的界限,写出更有分量的文字,这是季羨林望之叹然的。

三、金克木
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金克木的学术路径都是非典型的。他自学成才,兴趣广泛,介于文学与哲学之间,涉猎的内容是广泛的。与一般的写作者不同,他的表达很少文人腔,也无故意求新的笔法,性之所至,文亦随之,打破了文章的套路,跳跃性与陌生化的辞章每每有异趣挥发。他的散文随笔分几类:一是早期生活的回忆,二是治学心得,三是人物追忆。这些内容不一的断章构成了他自传式的精神长廊。

做过北大图书管理员的金克木,知识触觉丰富,接触过不同专业的学者,自己又充满好奇心,对民国学术的判断,都不以流行色为唯一参照。其文章介绍过往的历史,给读者赏心悦目之感。因为自己是翻译家,懂得多门外语,他对文化历史的体味也是多元的。所以无论是介绍佛学变迁,还是对于新史学的认识,他提供的东西是多的。

金克木的生活记忆的再现,都非一般书中可见,他与不同流派的知识人都有交往,能够以好奇的眼光欣赏各种类型的人物,言及自身,也不乏自我嘲讽的意味。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,袒露思想的自然,能看出受到卢梭(Jean-Jacques Rousseau)的影响,但言及求知之路,也有罗素(Bertrand Russell)的元素。在对待记忆的问题上,他本乎真实的原则,又不忘思想之情怀。如何求知,怎样爱恋,与时代的关系如何,他提供的都是同代人鲜见的经验,年轻

时与戴望舒等人的诗人梦,流水般冲出湿地,看到的是思想的绿色。《代沟的底层》所勾勒的一群学者、诗人的面影,看出其对于中外审美的接受之深。温源宁、吴宓、钱锺书、南星,以及英国诗人艾克敦(Sir Harold Acton),衬托出一道文人的光廊,那些曾经被遮蔽的人与事,对金克木而言,有所神往,也有所隔膜。但善于欣赏他人之美者,自身亦美。金克木与读者有时候亲近,源于自身的这种美德也说不定。

读人的趣味,在他那里是一种难得的色彩。《末班车》《译匠天缘》是对知识人特殊经历的回望,其中不经意间透露出学术史的边边角角。《忘了的名人》写对傅斯年的印象,形体与声音跃然纸面,介绍了大陆学界多年来颇为陌生的学术片段。《记曾星笠先生》涉猎的学者甚多,黄侃、陈寅恪、吴宓、罗常培等,内中有诸多思想的影子。比如罗常培对曾星笠的评价,就看出彼时的学术风气,令人神往的氛围缭绕在句间。他和一些左翼倾向的报人、记者也有交往,《少年徐迟》《悼子冈》《徐盈的未刊小说》,时代风云里青年人的性格、爱好与精神形影也都得到聚焦。透过这些文字能够看到他文坛、学界、报界关系的多样化,他眼中的作家、学者和记者背后的时代风气,也被一一触摸到了。

金克木的读书札记与一般学者不同,有一点怪味在,因为他精通多门语言,知识谱系较为多样,对各种理论和观点,都非简单的归纳,而是有融汇之处,同时也有着批评的眼光。他在大量文章中谈到读书之乐,认为各种学问都有自己的规律,所以对事物的判断需谨慎才是。《读书》一文强调文字的阅读之余,读人也是重要的,他以为学一思一行是不可或缺的,而重要的是读一些“不合吾意”的书,以免自己变得偏狭。《用艺术的眼光看世界》谈及在科学、宗教、哲学之外,艺术思维对理解问题的重要性,作者试图绕过思维惯性,以感性直观看待世界,显得很有意义。《逃犯的剃刀》介绍“奥卡姆的威廉”如何以自己的思想剃刀结束了中世纪经院哲学,其对思想的开放性与审美的多元性的渴望暗藏在叙述语态里。他在《“书读完了”》中写到经典阅读的重要性,意在超越浅薄的功利主义阅读,不被浅薄的书籍所影响。文章的题目看

似有些狂意,其实是几十年经验的结晶。比如读经问题,他的看法就很中肯,批判旧传统,就必须先了解传统。“如果一点不知道‘经’是什么,没有见过面,又怎么能理解透鲁迅那么反对读经呢?所谓‘读经’是指‘死灌’‘禁锢’‘神化’;照那样,不论读什么书都会变成‘读经’的。”^①

由此也可以看出,他的思想与“五四”精神多契合之处。超越了汉语的思维,在世界史范围理解中国,是他的文章有超拔之气的原由。他所感兴趣的人物与典籍,都是在大的文化维度里的存在,笔锋所至,思想的涟漪荡起,就比国内一般的散文随笔要有辽阔之意。《陈寅恪遗札读后》介绍自己与陈寅恪的交往,文章提及的李济、邓广铭、季羨林等人,虽是点点滴滴,但能够看出特殊的知识群体的价值。王国维后,中国知识界的少数思想者的实践,对今人的启示犹在,金克木对一些常识的普及,突破了国人思想的盲点,使得可思考的空间变大了。在其写作里,处处可以看到丰富的背景下走出的精彩人物。《父与子》描写了印度学者饒赏弥、高善必父子的学问之路,他们对佛学、马克思主义的喜爱,如何影响了自己的学术,都能开阔读者眼界。这不仅仅有益于了解古代佛典的阅读,其实也映现出现代亚洲知识界的一股精神之泉的轨迹。金克木的文章使传统的士大夫暮气显得不足为道,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变得可笑起来。他的作品并不炫耀什么,却能够打开视野,让读者在一种新的维度重申己身。黄德海对他的评价十分贴切:“不管谈读书还是论文化,凡涉及空间上的西方和时间上的古代,金克木从不沉溺怀恋,发思古之幽情,而是句句不离当时置身的文化情境,旧学遂能安然转化为新知。”^②

四、蓝英年

蓝英年出生于 1933 年,幼时随父亲到晋察冀边区,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。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去苏联讲学,翻译过《日瓦戈医生》《回忆果戈理》等著作;90 年代在董乐山推荐下给《读书》开辟专栏,介绍苏俄文学的历史,一时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识。他的随笔除了见于《读书》外,还在《随笔》《博

览群书》《文汇报》等报刊传播,为转型时期的思想界与文坛带来了新风。

由于他亲临过苏联实地,又了解中苏关系史,他的作品为重新梳理苏俄文化的本源提供了重要视角。已经定型的苏俄文学史,因为他的另类叙述,得到重新的审视。他的简约、朴素的笔法与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潮,构成了一种反差,静水深处,暗流涌动。其散文并不以辞章深奥而耀世,也无说教气,但显得锐气横生,灼见如电。一是描述了自己的亲历性体验,直观地表达了对苏俄文学的印象;二是大量新材料的介绍,纠正了以往文学史的简单化和错误观念;三是从经典的阅读里,重审思想之要义。其作品在学者散文随笔中,发展出别样的叙述风范。

以往人们对苏俄文学的神秘性解之不多,蓝英年在与作家、学者的接触中,体会到斯拉夫文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。《狄康卡漫笔》是在果戈理故乡的纪行,将乌克兰小村庄背后的历史与无数诗人、作家的面影叠印在一起。果戈理《狄康卡近乡夜话》、普希金《波尔塔瓦》都关于于此,作者在美丽的俄语节奏里,看到了伟大作家的灵魂跳动。《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寻踪》记叙了作者在海参崴二道河子寻找曼德尔施塔姆遗迹的故事,一段悲怆的历史和思想的灵光在夜里游动,直觉与沉思里流出的冷气,直逼人心。《苏联国歌作者访谈录》有着教科书里没有的精神离奇,蒙在尘埃里的人与事,如电影般晃动着神奇。对比瞿秋白、曹靖华那代人的苏联印象记,他的作品有了前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史的沉重。

在大量新发现的资料里,蓝英年重述文学的背景和人物历史,所描述的陌生的人与事,为了解俄国与苏联文学提供了不少的注释性元素。《高尔基出国》呈现的是复杂的画面,苏联成立初期的风云显得更为具体。《马雅可夫斯基是怎样被偶像化的》有先前研究文章中没有的生动细节,高贵的诗人与凌乱的生活,以及吊诡

① 金克木:《书读完了》,第 5 页,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。

② 孙郁:《偏路旁也能见大树》,《解放日报》2024 年 11 月 28 日。

的政治风暴,写得具体而逼真。《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》《苏联作家巴别尔最后的日子》《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沉浮》从迷雾般的日子走来各类幽魂,映现出思想观念的另一道风景。蓝英年喜欢以细节展示事件的始末,从对话、书信、档案里再现诸多人物的命运。比如《费定会做人》将小说家身份之外的费定的特点勾勒出来,由一个人的复杂性来看艺术的生成和做人的智慧,其实也是时代风气的另一种折射。苏俄文学之所以生动、复杂,有其震动心灵的地方,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某些解释。那些在政治史与心灵史中呈现的诗文,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。

坦率、深沉和诗意的内心,在蓝英年的文字里始终成为一种原色调的存在。他细读作品的的能力较强,对文本的臧否不留余地。《再读〈群魔〉》《重读〈被开垦的处女地〉》《由〈蓝色笔记本〉说起》等,提供的视角和思想维度都较前几代人不同。作者对《群魔》的细读,除了情节的梳理外,引出高尔基与列宁当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的态度,他们既肯定又否定的目光,也诠释了《群魔》的魅力。而他对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的批评,既忠实于自己的良心,也写出文本背后神秘的存在。这既是对文本阅读感受的记录,也有传播史的重现,对进入作家的内心世界起到一种引领作用。

蓝英年的散文随笔在看似自然的陈述中,隐含着思想的风暴,文字回荡着历史的足音。他的写作其实是与多种既定的文化观念的对话,拆卸了认知之墙,告诉读者俄罗斯的另一面。而对那些早逝的作家的描述,不无慨叹,他的中国知识人的视角,已经失去先前的盲从与武断,他在细节和真实性里,勾画 20 世纪斯拉夫文化的另一幅图景。这些随笔不仅刺激了小说家、诗人重读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,也刺激了学界对于苏俄文学史的重新叙述。他以亲历的口吻道出历史的隐秘,短短的

文字,比那些宏大的学术叙事更富有魅力。在静谧里有轰响,平白中带缠绕,思想之波与诗意之波在辞章背后涌动,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新型典范。

小结

上述四人,是社会转型时期写作的活跃者,他们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写作的态势,成绩也各有高低,宽窄互见。杨绛偏于冷,季羨林略显热,金克木亦冷亦热,蓝英年则冷中带热。所谓学人散文,乃包含治学者的情怀,因为是偶尔为之,就显得不拘一格,出出进进间透出广远之意。久在书林之间,博览中外典籍,内心体味的要义主要在论著之中。但那些不能进入逻辑世界的片影,往往在笔记与随感中露出,加之远离俗谛,冒出文坛未有之声。不必代言什么,亦非宏大叙述,在日常生活的描述里,也无意间渗透出非凡见识,有思想者的本色。这使写作者释放出杂识与杂趣,与古代文章和域外随笔的气韵互渗,所谓智性的高扬正是如此。这类文体,在周氏兄弟当年的实践中有之,20 世纪 90 年代后被许多人继承下来,他们经历过思想的磨砺,自觉衔接了“五四”文脉;也有绕过周氏兄弟传统而独辟新径者,这使散文的路宽阔起来。总结起来看,学者的写作有时候看似不近人间烟火,但多有个性追求的自觉和文体的自觉,目光里是一连串的狐疑与猜想。在缺少思考的文坛上,本乎内心,忠于学理,不是人人都可做到。以自己的笔墨,捍卫母语写作的尊严,可说是时代之需,也是文学之需。

【作者简介】孙郁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、当代作家作品、鲁迅学。